

# 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sup>①</sup>

任 玮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要:**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胡姓的汉化与汉姓的胡化现象。胡姓的汉化是历史的需要,汉姓的短期胡化现象,是统治者为解决孝文帝改革留下的隐患的权宜之计,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键词:**胡姓;南北朝;汉化;胡化

**中图分类号:**K239;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5-0051-05

## On the Political Purposes of Surname Foreignization and Sinicizatio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Wei

(Pingdingshan College,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0)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re appeared a surnam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The sinicization of minority surnames is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while the foreignization of Han surnames into minority ones is just a short-term historical phenomenon, which helped the rulers to solve the hidden dangers left by Emperor Xiaowen's reform, but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northern minority's hanization will not be changed by people's will.

**Key words:** Minority surname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inicization; foreignization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周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在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逐步封建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我国历史上许多古老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巴以及其他各种胡人,大体上都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进程,融合到汉族中(羌、匈奴主要指内迁部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隋唐的统一强盛局面是与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分不开的。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反映到这一时期的人口姓氏,那就是胡姓的汉化与汉姓的胡化现象了。

### 一、胡姓的汉化现象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不同民族不断融合

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说到胡姓的汉化问题,南北朝时期当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他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中,改汉姓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也是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此时的改汉姓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由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并且有全面的改革方案。

他首先自己带头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近亲及贵族也相应汉化。“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尉迟改为尉……“其余所改,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云:“其先姓乌石兰,从拓跋魏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0-04-02

作者简介:任 玮(1982-),女,河南省平顶山人,平顶山学院教师,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人口史研究。

氏入夏,居河南,遂去‘乌’与‘兰’,独姓石氏。”(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北魏献文帝侯夫人,“本姓侯骨,孝文皇帝徙县伊京,夫人始赐为侯氏焉。”<sup>[1]42</sup>这样乍看起来,汉化后的胡姓与汉姓就很难区分了。同时,把南迁洛阳之鲜卑族人郡望改为“河南洛阳人”,这就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与汉族认同的意识,在姓氏上消除了民族差异与隔阂,有利于形成胡汉上层日渐混同的融合局面。

关于这次胡姓的汉化形式,孝文帝是把鲜卑复姓大多改为单姓。这些少数民族姓氏除少数保留复姓外,在这次改革中基本上都改成了单音节汉姓。马长寿先生这样概括:“少数部族复姓简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在原来复姓的基础上,减去一个或几个复音的字,留下一个在汉姓中比较常见的单音字,作为简化的单姓。”<sup>[2]84</sup>如贺赖氏改为贺氏,可地延氏改为延氏,仆兰氏改为仆氏,普陋茹氏改为茹氏;“又一种方法,可能是因为在原来复姓内找不到一单字与当时流行在关中的汉姓相同,于是产生了另一些方法:一种方法是舍弃了复姓中的任何一字,只取其一音与汉姓相同或近似者作为它们的单姓。”<sup>[2]84</sup>如茹骨氏改为胡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另一种方法是并无音与义的根据,以某些偶然的理由,取汉姓中的一个单姓作为它们的姓氏。”<sup>[2]84</sup>如独孤氏自认为是汉朝公主的后裔而改姓刘,屋引氏因为虏俗谓“房”为“屋引”,而改为房氏。当然,也有些胡姓仍旧是复姓,《魏书·官氏志》云:“贺若氏,依旧贺若氏。”另有那氏、庾氏等,据《北朝胡姓考》,皆在太和改制前已改为单姓,所以《魏书·官氏志》中称其依旧。

孝文帝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定姓族,即下诏“定诸州土族,多所升降”(《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以此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太和十九年,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

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缙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缙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魏书》卷113《官氏志》)孟聚先生总结孝文帝的姓族制度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森严的等级性;(二)有关缙麻服的规定说明汉族儒家的宗法观念对鲜卑文化的渗透程度;(三)尽管孝文帝宣称,制定姓族的门第高低一时还来不及,但其详备已不难想见。”<sup>[3]</sup>孝文帝以帝王的权威和法律的形式制定门阀序列,调和了胡汉士人之间的矛盾,使他们的利益更趋一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界限日益淡化。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使鲜卑贵族更快融入魏晋以来崇尚汉族高门的社会,“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并让咸阳王禧出身低贱的原配妻子居于妾位,皇家婚姻必选右族。从现今出土的墓志资料来看,嫁给北魏宗室的汉族女子,多来自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琅岈王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顿丘李氏、京兆杜氏等,同样尚公主的汉族驸马,除了高、冯两家外戚,多来自卢氏、王氏、李氏。这样就打破了“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的规矩(《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皇族和汉族士人通婚,一般鲜卑人自然要效法,入居中原的鲜卑人很快被汉化融合了。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法律形式肯定了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成果,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孝文帝改代人姓氏,令著籍河南,以八姓与汉人高门并论,清除了统治阶级上层的隔阂与矛盾,形成了门阀体制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相结合的统治集团,加速他们的合流,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也对以后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二、汉姓的胡化现象

北魏孝文帝为汉化进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功

不可没,他甚至为此处死了太子元恪。但后来六镇的起义,尔朱荣“河阴之变”大肆屠杀北魏宗室贵族,使孝文帝曾经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宗族十姓、勋臣八姓制度都被破坏。北魏后来分裂为东、西魏,鲜卑门阀体制彻底动摇。此后,以高欢为首的怀朔镇豪酋,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豪酋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东魏,北齐“一切大权都操之于胡族军事新贵,汉族士大夫倍受压抑,有的胡贵甚至大肆杀戮‘汉儿文官’,称汉官为‘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却。’不仅‘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朝廷中也大力提倡用鲜卑语,至于胡姓,事实上是在社会上通用着。”(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连皇后李祖娥都改姓了“可贺敦氏”。(《北齐书》卷9《文宣李后传》)

在汉姓胡化过程中方面,宇文泰集团走得最远。在现今出土的北周墓志资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孝文帝将胡人三字姓氏改为单字,可是到北周一切复改从旧。他们打破了孝文帝胡汉合流的体制,重建以武川鲜卑贵族为主体的制度。宇文泰复兴鲜卑姓氏,即恢复鲜卑族原来的复姓,大统十五年(549年):“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北史》卷5《魏本纪第五》)即元氏复为拓跋氏,原汉化的姓氏各自改回原本胡姓。

为重建新秩序,当时的新军将领,除在六镇仍保持复姓者不动外,其他人皆按功劳次序,将已改的汉字单姓恢复为鲜卑旧姓,如于姓仍改回为勿忸于氏;魏主谋诛宇文泰,谋泄,泰废魏主立其弟齐王廓,复姓拓跋氏。或由西魏政府赐以三十六部落中的一个姓氏,将汉姓改为胡姓。例如,王雄为可频氏,王勇为库汗氏,韦孝宽为宇文氏,杨绍为叱利氏等等。据载,大统年间被改为复姓的还有苏椿为贺兰氏,李和为宇文氏,梁台为贺兰氏,刘雄为宇文氏,田弘为纥干氏,阎庆为大野氏,王杰为宇文氏,杨纂为莫胡卢氏,段末为尔绵氏,令狐整为宇文氏,李昶为宇文氏,唐瑾为宇文氏、万纽于氏(于谨愿结为兄弟而改),薛善为宇文氏,杨尚希为普六茹氏,张暉为叱罗氏,等等。而以赐姓宇文者为最多,连张轨、申徽、崔谦、郑孝穆、柳敏等汉族高门大姓,也皆被赐之。根据《大周柱国谯国公夫人故步六孤氏墓志铭》,“夫人讳须蜜多,本性陆,吴郡吴人也。……高祖载,为刘义真长史,留镇关中。既没赫连,因即仕魏。”<sup>[1]484</sup>很明显,这个“步六孤氏”,是汉人

“陆氏”所改,其家族是因为被北朝俘虏而出仕北朝的,祖、父两代都是将军,《魏书·官氏志》中,“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所以在北周复旧姓的政策下,这个汉姓也被“复”或者“赐”为胡姓了。

同时,宇文泰集团实行的府兵制也颇有特点。魏恭帝元年(554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卷2《文帝本纪下》)军队复姓制一直被北周统治阶层当作军事血缘关系的纽带,例如拓跋虎、叱罗协、独孤信、独孤藏、若干云、尉迟运等,都是北周统治阶层赐予复姓的。他们不仅作为一姓的“宗长”,也是这一部落的酋长,以表示他们都是三十六大部落或九十九大氏族的嫡系子孙。这些鲜卑、汉族将领所统率的士卒,又以他们主将的鲜卑赐姓作为他们的姓氏。如独孤屯,本姓李氏,“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隋书》卷55《独孤楷传》)这个李屯以从主将独孤信而得姓;高宾,“背齐归周,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隋书》卷41《高颀传》)同样的例证,又有唐瑾和樊深。唐瑾,“赐姓宇文氏。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朝野所属。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周文叹异者久之,更赐瑾姓万纽于氏。瑾乃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瑾亦庭罗子孙,行弟侄之敬……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北史》卷67《唐永传》)樊深,“周文平河东……寻而于谨引(樊深)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北史》卷82《儒林下·樊深传》)唐瑾和樊深作为于谨的僚属,得蒙主将之姓。即所谓所统军人,改从其姓也。另外,改姓的范围比较宽广,不仅仅包括了所统领之部队。据《李和墓志》载:李和“赐姓宇文……同乡旧狎,始得移宗”,<sup>[4]325</sup>“同乡旧狎”也在改姓行列出现了。

西魏北周时的女性也出现了被赐胡姓的现象。如北周“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李)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周书》卷25《李贤传》),以报养育之恩;北齐孝昭皇后元氏,“开府元蛮女也……赐姓步六孤。”(《北齐书》卷9《孝昭元后传》)又如韦孝宽的夫人“荥阳郑氏

改姓贺兰”，<sup>[4]</sup><sup>315</sup>也算是封建社会夫荣妻贵的体现吧。大概是因胡族掌握政权，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不大。

### 三、胡姓与汉姓互化的原因

1. 胡姓的汉化是历史的需要。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sup>[5]</sup>恩格斯也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sup>[6]</sup>孝文帝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需要。由于华夏(汉族)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为了有效地掌握政权，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包括主动采用汉姓。不过这类改变一般是逐渐进行的，根据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前言)中的论述，改汉姓的现象，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许多民族中都已开始。两汉已开始予胡族人以赐姓之风，从东汉末年起，北方和西方的匈奴、羯、鲜卑、乌桓、氐、羌等族，开始大量内迁，至西晋时，民族内迁达到高潮，从而在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胡汉杂居，以致在汉族活动中心的关中地区，“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卷56《江统传》)。于是在西晋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瓦解之后，北方先产生了“十六国”，随后是北魏的统一北方。这些政权的多数，都是以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在此期间，虽然民族矛盾斗争极为激烈，但民族融合也在加速发展，随着内迁各族汉化的不断加深，改汉姓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北魏孝文帝改汉姓之前，胡族改汉姓多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直到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胡族改汉姓的现象才上升为国家意志，由统治者倡导，并用法律来确定。

曾经一度攻灭拓跋代国、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一战失败后迅速崩溃。北魏应该如何巩固统治，而不至于重蹈覆辙，从道武帝到太武帝，都在为此而努力，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上。孝文帝拓跋宏自出生以来，一直由北魏的实际统治者冯太后躬亲抚养。她出身北燕皇族，

汉族血统，自幼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她是5世纪80年代汉化改革的最重要决策人，“其为以文明人入野蛮部族，亦燕魏之为婚媾同也。高祖之教育，葺全受诸文明后。”<sup>[7]</sup>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足见其汉化影响之深，“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毅然独断，大革胡俗。”<sup>[7]</sup>他既深谙汉族文明之先进，又熟知北魏政权的种种弊端，承袭冯太后执政时的汉化措施，抛弃民族偏见，走历史必由之路，把北魏的汉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迁都洛阳，改衣冠，断北语，改姓氏，通婚姻，“元魏之国情，实至孝文迁洛而一大变。”<sup>[7]</sup>“孝文帝欲使其子孙君临东夏，长治久安而勿替，故必加强汉化，使中原人民，泯灭夷夏观念。”(王仲荦《鲜卑姓氏考》上)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孝文帝非常清楚姓氏是族际间最明显的差异，最易形成民族隔阂。复杂的胡姓也深为一直受儒家传统影响的汉人士大夫所轻视。如陆睿，“字思弼，年十余，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北史》卷28《陆侯传》)。可见，尽管此人年轻有为，但是他的冗长的姓氏还是难以被当时中原世家大族所接受。所以，孝文帝为了消除民族文化差异和提高胡族的社会地位，推动鲜卑贵族向文化士族转化，消除他们与北方汉人中文化高门的矛盾，将姓氏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孝文帝既迁都洛阳，欲以中夏正朔自居，欲牢笼中原世家大族为其政权支柱，势必汉化。”(王仲荦《鲜卑姓氏考》(上))可见，胡姓的汉化乃是历史的需要。

2. 汉姓的短期胡化现象，是统治者为解决孝文帝改革留下的隐患的权宜之计，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孝文帝改鲜卑姓氏为汉姓之后，鲜卑八姓与汉族四姓相等，都是作正员郎以上的清官，不入姓族的就被排斥在门阀行列之外。完全承袭“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魏晋遗风。(《魏书》卷60《韩麒麟传》)“南迁洛阳

之鲜卑族人,往往得上品通官,各各荣显……而留住北方边镇者,号曰府户,役同厮养。”(王仲荦《鲜卑姓氏考》(上))而未列入八姓的鲜卑军人,尤其是戍守北方的六镇军官,多为拓跋部贵族及其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没有改汉姓,因而被排斥于门阀之外,地位较低,仕进困难,与改姓之人产生了各种矛盾,从而心怀怨愤;被统治的广大镇民遭受主将、参僚和豪强的欺凌奴役,土地被剥夺,承担着繁重的官、私力役,还被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北边六镇兵民身份日益低落,生计日益艰难,乃有反对汉化的倾向,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尔朱荣平定六镇后,掌握政权,“河阴之变”屠戮王公贵族,代表着六镇豪强对洛阳汉化的鲜卑门阀贵族的仇恨情绪,使北魏的门阀制度从此一蹶不振。尔朱荣之乱平定后,政权再次落入六镇豪强出身的高欢和宇文泰手中。高欢、宇文泰都出自六镇,他们的基本成员大多数属于未南迁的鲜卑人,所依靠的主要是怀朔镇的中下级军官和六镇流民,他们在文化上仍保持着胡风。高欢和宇文泰为争取得到这些六镇豪强和流民的支持,不仅纵容、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迎合他们的偏见,推行反汉化的政策,如用鲜卑语,着胡服,恢复胡姓或赐给胡姓等。

俞安志先生总结道:“考其宇文泰组织的府兵制里将领的复姓,是有其政治目的和社会组织的色彩的。宇文泰在编制新军的时候,对于士兵和军官之间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这样在表面上泯灭了鲜卑和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界限,泯灭了鲜卑、汉族混合军队里的民族成见。这种鲜卑旧日部落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强化了中央的力量,客观上起到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团结。”<sup>[8]</sup>陈连庆先生也评价说:“宇文泰集团恢复胡姓的目的在于加强胡族贵族内部以及胡汉统治者之间的合作,而被改姓者则因之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庾信《出自蓟门行》中记:‘梅林能止渴,复

姓可防兵。’说明复姓在社会上有特权地位。”(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前言)这说明,当时宇文泰集团的汉姓胡化政策是当时统治者的权宜之计。西魏大统以后,宇文泰当政,欲籍此网罗英杰,为己羽翼,扩大政权基础,以倾覆魏室。

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的汉姓胡化,是对孝文帝改制的一次逆转,但为时并不久,而且主要是作用于上层社会,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已不可逆转,北周杨坚执政的大定元年(581年),便重新下诏“以前赐姓,皆复其旧。”(《隋书》卷1《高祖纪》上)所以西魏时期以来,改为鲜卑姓氏的文武百官,再度改成汉族单字姓氏,又重新恢复了孝文改制以后的状况,至于社会上还有胡族旧复姓存在,那已是属于汉姓的组成部分了。

#### 参考文献:

- [1]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2] 马长寿.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3] 孟聚. 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J]. 许昌师专学报,1990(2).
- [4] 罗新,叶炜.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
- [7]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 台北:开明书店,1977:610.
- [8] 俞安志. 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6.

责任编辑:骆晓会